

大师风范

(人文社会科学卷) 下 册

主编 中国老教授协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资助成果

大师风范

DASHI FENGFAN (RENWEN SHEHUI KEXUE JUAN)

(人文社会科学卷) 下 册

主编 中国老教授协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师风范·人文社会科学卷 / 中国老教授协会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04-039955-4

I. ①大…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科学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 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3747 号

策划编辑 王建强
责任编辑 郎 文
封面设计 张 楠
版式设计 张 楠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总 印 张 62
总 字 数 1107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9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9955-001

侯外庐



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为科学精神，后者表现为自我批判的勇气。

大师简历

侯外庐（1903—1987），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1903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1922年，考入北京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1924年，与我国共产主义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相结识，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主编进步刊物《下层》。1927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著名的巴黎大学。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主编由周恩来同志创办的《赤光报》。在法国留学期间，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著《资本论》的翻译，1937年，他与王思华合作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全译本出版，此外，他还译出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的一部分。直到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才停止翻译工作。

侯外庐先生回国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宣传工作。结集出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和《抗战建国论》，在重庆担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是我党当时出色的政论家。

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先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此外还曾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侯外庐先生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侯外庐先生是史学巨匠，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学为人师 德为人范

——记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

陈谷嘉

先生故去已24年，对先生的记忆时时在我脑际勾起。

四月的长沙，春雨绵绵，依傍着书案，我正襟危坐着，凝视窗外，雨丝飘落，彤云低锁，天空一片朦胧。在此寂静时刻，我似乎看到了恩师侯外庐先生向我走来，他身材瘦高，衣着整洁，仪容庄重儒雅，步伐从容，走路不疾不徐，不偏不倚。从他的步态中，我感觉到一种方正、质朴的风范，一种学术的严谨与厚重凛然目前；先生从书本中走来，从古人中走来，外面世界的喧嚣、嘈杂，都未浸入他的思维，他总是从容不迫，张弛有度，沉静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是行走在思想中的思想者，是思想史世界中的独行者。“诚于中而形于外”，也许我无法读懂侯先生的学术思想，但同样能感觉他的风度与魅力，感受到那种学术的尊严、力量与光辉。

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1959年9月的一天，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承侯外庐先生（当时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未分家），在其门下学习中国思想史。大学时期，我早已仰慕先生，深深地被他深邃的学识和思想穿透力所震撼，期望有一天拜师门下，成为先生的学生。愿望终将成现实，当时有说不出的高兴。

三年多的时光，先生对我耳提面命，虽已过去50年，先生也早已作古，但先生的教诲犹在耳边，先生的仪容风貌，似在眼前……一切往事，萦回脑际。

—

万千回忆中,首先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先生史学巨匠和思想家的身影,是先生毕生对史学研究的贡献。他60年来在学术上不竭耕耘,耗尽了心血,为后人留下了大批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性的传世之作,主要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宋明理学史》(主编、上下卷)、《论汤显祖剧作四种》《韧的追求》《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册)。先生是学贯古今而横跨中外的学者,为学涉及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学识渊博,是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先生建构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几十年来,我不断从先生的著作中汲取不竭的营养,今日掩卷,勾起我对先生学术贡献上的感想种种。

先生是第一个古代中国文明路径的提出者,是第一个发现中国古代与古代希腊、罗马由“前文明社会(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奴隶社会)”出现了“分岔点”,这就是中西古代并行而相互辉映的两种不同的文明路径。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代社会史大论战的疑团作出了正确回答,澄清了对古代社会性质认识的思想混乱。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围绕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展开了大论战。参加论战的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学者,也有苏联和日本的学者,论战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其中有一种以西方文明图解、或者说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国历史的倾向,把中国历史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论战中欧洲中心论的烟雾很浓。另外,苏联学者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独立的文明形态,把中国古代文明说成“空白史”“变种论”“过渡论”。当时参与论战的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肯定了中国历史存在着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论证了中国社会发展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已开始摒弃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观,但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何特点、是否有自己的文明发展路径的问题上,并未涉及,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出现异于西方历史的独特的现象和历史疑团尚未解开。

侯先生当时由于忙于《资本论》的翻译,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他对论战很关注,并从中得到许多的启发,萌发了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兴趣,从1932年开

始，他从经济学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韧的追求》一书中，先生曾这样叙述道：“我个人对这门学科（中国古代史研究——按）探讨了十五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认识。”^[1]先生经过15年苦心研究，于20世纪40年代著述了在古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针对论战中的主要问题，发表了颇有创见卓识的观点：“我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上已有明晰的概念，即它所支配的社会构成是‘早熟’与‘维新’的古代东方国家，它和‘古典’的（指古代的希腊、罗马）虽有先后出现的距离，而在本义上则是类型的同一，惟二者的路径有差别。”^[2]侯先生虽认为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起源有同一之点，但指出这两种文明发展的路径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意即说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走的是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的路径。从此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古代中国文明发展路径的用语与概念。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路径，侯先生作了精辟而常被学者们引用的如下概括：“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社稷。所以，前者是新旧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路线，用中国古文献的话说，即是前者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后者则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3]侯先生言简意赅的概括，是对古代中国文明的“探源性研究”，举其要者言之有如下几点含义：其一，所谓“古典的古代”是指古代的希腊、罗马，“亚细亚的古代”则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其二，古典的古代所走的文明的路径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意即说古代希腊、罗马是经过氏族而私产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从国家是私产发展和氏族血缘关系被粉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路径是新的冲破了旧的，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是革命的路线，是“正常发展的小孩”。其三，中国则不同，“是从家族到国家，

[1]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2]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16页。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

[3]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5页。

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这就是说古代中国是从氏族血缘到国家，氏族血缘关系不仅未打破，相反的，国家是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的，国在家中，“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家国同构。从国家即文明社会是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财产共有”的产物而言，古代中国文明路径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新的，是维新路线，是“文明的早熟”，是“早熟的小孩”。其四，古代中国与“古典的古代”两条文明路径，侯先生用中国古语把前者概括为“人惟求新，器惟求新”，把后者喻之“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侯先生以上关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的阐发，深为学界折服，被学界比喻为20世纪30年代混沌状态的史学研究出现的曙光，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知名学者陈瑛说：“一当郭沫若、侯外庐等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这个领域就立即出现了曙光，一向迷蒙中的大地出现了山川平原，千百条纠缠在一起的史实和线索被理得井然有序。人们从这里看到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何等光辉的成就！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其中有时代的赐予，更有个人执着的追求。侯外庐先生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在侯先生诞辰一百年、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名义发表的文章说：“在新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之中，侯外庐同志对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研究贡献最大。”^{〔2〕}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说：侯老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跟郭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却是代表两个时期的著作。郭老当时的功劳是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同人类发展的一致性，他还没有把中国的特点找出来，还没有来得及讲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外庐同志在这一点上有他的贡献。打开《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每一个题目都是新的。”^{〔3〕}如果说以上是中国学者的评论，那么几十年后与侯先生毫无联系的美术考古学者张光直先生，也提出与侯先生观点一致的主张。张光直一篇引起普遍注意的著作《连续与断裂》，讲的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他说：“世界文明的起源（即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有两种不同的道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的西方的道路是一种断裂的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道路是一种连续的道路。两者根本不一样，造成的古代文明截然不同。中国夏、商、周三代血缘关系遗存犹在，而在希腊、罗马就不同了”。张光直先生特别指出以他的知识来看，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路径是多数，像希腊、罗马那样反而是特例。他

〔1〕《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0月30日。

〔3〕《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说：“西方科学界总结的一些普遍原则不一定普遍的”，但相反“中国的例子反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1〕}侯先生与张先生睽违两地，路隔天涯，从未谋面，不是同时代人，从没有信息交流，竟然得出了相同的主张和思想，要说是巧合，不如说一个真理必然会被多人发现和证实，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印证了侯先生的卓识。特别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西方科学界总结的一些普遍原则不一定普遍的”，相反的“中国例子反而具有更大普遍性”，这是西方学者对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文化观的批判，毫无疑义，这也是对侯先生的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的判断的有力支持。

侯先生对这一段时期史学研究有很真切的感受，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时，他写下了如下的感受：“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评议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了。”侯先生的感受反映了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气象，从评议到概念、从方法到判断都是新的，翻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一页，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观在学坛上黯然失色，侯先生等一代史学家为后学们开辟了一条史学研究新道路。

侯先生关于古代文明路径说，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的秘密，以往中国历史发展中许多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都可由此找到它发生的源头，找到它的答案和历史的见证。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是血缘宗法性社会。因为中国从野蛮到文明社会过渡，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在此家和国同构的国家形态中，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必然是一种宗法性的社会，质言之，君权与父权是同一的，君权只是父权的引申和扩大，君主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大的家长，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其政权具有不可转移性，王朝的轮替，意味着一家一姓政权的轮替，如此循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是一家一姓统治的家天下。

中国古代宗法关系另一重要表现是，在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古代居民是按血缘关系而不是按地域关系划分的，人际社会关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的面纱，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被掩盖，古代中国社会的“五伦”秩

〔1〕 参看李学勤：《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13日，“学术”栏

序是严格按“亲亲”“尊尊”原则排列的，如此等等，都可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中找到发生的源头。

同样，诸如下列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文化与西方古代不同的特征，也可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中追寻到根。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忠和孝始终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并被当作政治权威原理而奉行呢？为什么古代中国伦理道德是以“三纲”构成的体系？为什么中国古代先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重视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为什么中国成为举世少有的礼仪之邦？为什么中国古代先人奉行以人为本和笃守“天人合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什么中国古代奉行中庸之道，反对走极端？为什么直至当今有些地区家族、亲属关系仍受到特别的重视呢？如此等等，追本溯源，都是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特殊路径决定的。古代中国与西方古代的不同的文明路径决定中西思想文化不同的起步，质言之，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起步于“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君子世界”，具有贤人的作风，特别重视政治论、道德论、人生论，古代希腊、罗马则不同，他们的思想文化起步于“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市民世界”，所以表现出注重自然的智者的哲人气象。侯先生这种“探原性研究”和对“思想路线图”本原性的追寻，破解了困惑人们的历史疑团，不禁使人感到书中有路，学海有舟，在混沌的历史现象面前，忽然眼前一亮，穿透历史时空，云雾消散。侯先生古代中国文明发展路径说，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和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明路径说，也破解了封建专制主义形成和超常稳定性的难题。侯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从“前文明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保留了“公社土地所有权”，只不过土地所有权转化为殷周氏族贵族统治集团所有，形成了由皇族垄断的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土地和臣民都归君主所有，豪族地主以及政治上无特权的庶族地主，对土地只有占有权，土地上耕作的广大农民只有使用权。君主有权处置天下的一切土地，直到明代中叶以前都是如此。土地国有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压制土地的私有制的发展，从而在政治上抑制了离心力的倾向。因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扩张，必然导致土地私有者相应的政治权力的扩张要求，从而危及封建专制统治。土地国有从经济基础上培养政治上向心力的发展，由此封建专制主义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古代西方则不同，它们是由私产到国家，是封建领主所有制，所以西欧中世纪中央集权难以建立，王权式微，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支撑。

如果说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揭示了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路

径，那么他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两部著作，解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过程，提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近代化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简言之，西方国家是使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打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而使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道路；中国则不同，它是使农民由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为人身自由的租佃者、自然经济解体缓慢而资本主义生长和发展艰难的发展道路。侯先生在《韧的追求》一书曾扼要地叙述道：“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即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了活的。”^{〔1〕}侯先生认为如同古代中国文明特殊路径一样，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所走的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保守的道路。最主要的是受封建专制超常稳定性的拖累，封建解体缓慢，表现出中国近代文明的难产。

难产不等于中国社会不能近代化，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有走向近代化的内在机制，换言之，难产并不像有的学者以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唯有走西方的道路，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近代化似乎即是“西化”（近百年许多先进的人士曾幻想“西化”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但历史已证明此路行不通）。侯先生上述论断表明难产只是指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障碍和困难较多，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由于封建解体缓慢，实现近代化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中国社会近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同样可走上近代文明。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侯先生指出：“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2〕}明末清初新旧势力的冲突引发了社会大动荡，侯先生以思想家黄宗羲的“天崩地解”概括，指出“中国历史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与此社会变动相联系的，出现了“中国学术上的新气象”，在旧的传统中孕育出近代思想的萌芽。侯先生指出：王廷相、吕坤、王艮、何心隐、东林党人便是这种学术新气象的时代人物，为“启蒙者的先驱”，他们的思想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在此必须指出，反映和代表资本主义萌芽与生长的新思潮的早期启蒙思想概念是侯先生首先提出的，是他最早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中觉察到了启蒙思想的孕育和生长。检视历史，梁启超虽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把顾炎武、胡渭、阎若璩

〔1〕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9页。

〔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称为启蒙运动的代表者，但他并没有提出启蒙思想的概念，更没有提出明14世纪至17世纪便有早期启蒙者。侯先生以上论述，从经济上和思想上都证明了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已开始向近代化的演进。中国传统中确实蕴含着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内在机制。以为中国近代化必须走“西化”的道路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

近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中国近代文明是沿着古代文明的历史轨迹发展的，质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所走的也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道路，这反映在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生长的启蒙思想所表现出的自己的明显特色。侯先生指出：“中国启蒙思想家没有西欧以至俄国那种‘资产者——启蒙者’的格局”。^{〔1〕}这就是说，欧洲启蒙思想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尔后的启蒙思想发展，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的，主要表现为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中国的启蒙思想则非如此，主导启蒙思想运动的并不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只是一批反传统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和进步的思想家。虽然在思想文化中，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宋明理学和主张个性自由的近代思潮，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很艰难，旧制度的瓦解缓慢，资本主义迟迟未到来。启蒙犹如古代中国“前文明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是保留氏族血缘的维新路径一样，启蒙也是在新旧纠葛的情境中滋生与成长的，启蒙受到旧的传统拖累，即是侯先生常用马克思的“死的抓着活的”一句话加以形容。其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外表与内容的矛盾”。从外表看启蒙思想家打的是理学中王学的旗帜，标榜自己是王学学派和王门弟子，给自己身上涂上一层保护色，在内容上却是王学的批判者，对王学表现出明显的叛逆倾向，往往在旧的命题中阐发出新时代思想和主张，“旧的主词被保留下来，而用新述词讽刺了旧主词。”^{〔2〕}

另外，诚如上述中国启蒙思想家不像西方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和发动，而是由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进步人士所主导，所以中国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不同于思想家们的思想差异和特点。“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这时依据自己的不同角度去窥探世界的发展倾向。王夫之走的是知识形式的解放。黄宗羲走的路线是政治理想的乌托邦。顾炎武更走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即依据实际来作‘当

〔1〕 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7页。

〔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页。

世之务’的倡导。而颜李学派则强调劳动和科学，趋向于改革的实践。”^{〔1〕}侯先生以上对中国启蒙思想特点的概括，说明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并不是西方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并没有脱却古代文明路径开辟的历史轨迹。侯先生关于中国启蒙思想的论述，不仅进一步印证了古代中国文明路径说，而且勾勒了中华民族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对认识中国的国情都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义，这是侯先生继古代中国文明路径提出以后的又一重大贡献。

在此，还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侯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侯先生说：“在我的学术著作中，《中国思想通史》卷帙最大，凡五卷六册，二百六十万言。”（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除外——按）。^{〔2〕}侯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60年代初，付出了20余年的心血，完成这部鸿篇巨制，侯先生回忆说：“走完中国思想史的全程，是一场紧张的学习劳动，一定程度上具有披荆斩棘的开创意义……在海滨的沙上印下望海者的最早的足迹。”^{〔3〕}《中国思想通史》把上下几千年的思想发展过程展示无余，至今无出其右者。著作从始至终表现了作者的创新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心境。内容上有重大的突破，涉及儒家、道家、佛家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教育诸领域。不仅如此，儒、佛、道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均有论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思想史或者中国哲学史，不再是屈指可数的儒家代表人物，一大批被湮没而不与闻的思想家和所谓异端思想家出现在读者眼前，尘封的史料被发掘，好像地质学家探寻矿藏一样，新的思想家、新的史料，屡有发现，似久掩的中华文化文库被打开，把人们引入五彩缤纷和灿烂无比的世界。总之，《中国思想通史》从形式到内容、从规模到风格，在读者面前呈现的是全新的风貌，似这种全新性五卷六册的贯穿于几千年《中国思想通史》巨制鸿篇，比之为“开疆拓土”的传世之作，并不过分。

《中国思想通史》独树一帜的鲜明学术风格，影响了一代学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侯先生学术思想或者说是侯外庐学派最突出的风格之一。侯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历史不是思想家的历史，思想家头脑里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思想史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具有超前

〔1〕 孔华：《读〈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2〕 《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4页。

〔3〕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4页。

性和历史惰性,但它离不开历史发展的法则,否则,思想史就失去了本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仅个案思想家研究如此,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整体思想家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叙述一系列思想家之前有很长的导论,阐述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动诸方面的特点,把思想家纳入一个历史时代,或者说定位于一个特定时期,这是《中国思想通史》各卷共同遵循的规范。侯先生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便在当时学术界率先进行大胆的摸索和实践。侯先生后来曾这样回忆道:“把社会史与思想史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在我是第一次,在并时学者的同类著作中或者也是较早的实践。”^[1]侯先生由于不把思想家的历史看作是思想家头脑里的历史,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有血有肉的丰满的思想家,思想史不是简单的概念与范畴的逻辑演绎与推论,思想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反映并不是像照镜子一样直接的反映,而是通过“中介”环节实现的,这个“中介”环节是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便是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的“中介”。侯先生很注重从社会思潮中把握思想家,在研究中既关注“横通”的联系,也关注“纵通”的联系,从“横通”的比较中,既可发现时代思潮发展的趋势,在思想家的比较中也可发现思想家的个性。“纵通”可发现其思想的源流及其前后思想家之间的传承关系。侯先生《中国思想通史》所表现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突出风格,是经过他和“侯外庐学派”同人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摸索和总结的结果。他和同人们早年有一个共同约定——“在学术史研究工作中探寻真理,必须注意下列问题: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理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为从属而何者为主导,何以为断?”^[2]在此约定中提出六个问号,这个六个问号是在思想研究中必须要破解的问题,以此言之,《中国思想通史》之所以独树一帜,表现出鲜明的学术风格,就是破解上述疑难的结果。把研究预设如此高的起点,提出极有难度的设定的六个方面突破,先生学术研究之严肃与谨严,在学林中鲜见。先生力透纸背的论述,渗透字里行间的创新精神,发人遐

[1]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2]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想，促人顿悟。显示了先生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的魅力。以上是我捧读先生著作的感受，感谢先生给我知识，感谢先生给我智慧，我为学术上有这位学术大师和思想家领路感到荣幸。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随着岁月的推移必将长久地显示其生命力。

二

先生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固然受到学生的尊重，但先生一生在学术上坚韧不拔求真的科学精神，更使学生为之敬仰。在阅读先生的著作和平时接受先生的教诲中，先生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自然地流露，不知不觉深深地影响了学生，犹如磁铁吸附着学生的心灵，产生了难忘的记忆。

先生百折不回地在学术上“开疆拓土”耕耘的精神是受什么思想和力量支配呢？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甚明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读到先生晚年著述的《韧的追求》才恍然大悟，得知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而且是老革命家，不仅是史学的巨匠，也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先生热烈的爱国情怀、共产主义的坚定意志和毅力，是他一身“韧的追求”不竭的动力，是他治学坚守求真精神的力量源泉。先生是个极谦虚的人，从来不对学生言及他的革命经历，这恰恰是学生们所感佩的。学生后来才感悟到，学习先生的学术，首先要学习先生的革命精神，学习先生治学的求真的科学精神，更要学习隐藏在此精神之后的共产主义者追求真理的意志和信念。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先生于1903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西王智村。虽居山村，但祖辈至父亲几代都是读书人。祖父是个败家子，染上鸦片烟瘾，21岁的青春年华便离人世，家境由祖母操持，父亲在祖母的严格教育下，读书甚勤，清末乙未科拔贡，考得法官资格。时值康有为公车上书，父亲成了变法的热烈信徒。虽然家受封建宗法环境的包围，但他家很特别，不崇拜祖先，崇拜的是英雄。祖母年轻守寡，教子有方，名扬四乡，声名传至京城，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也为其事迹所感动，亲笔题词“巾幗完人”。先生和其父把祖母作英雄崇拜，幼时受到良好的家教，受祖母影响极深，诚如先生所说：“祖母是我步入人生所遇